

对拔苗助长式城镇化说不

刘晓忠

在近日于上海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表示,当前国内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约快1倍。这一反常现象引发人们对当前城镇化的可持续性的质疑。

城镇化加速推进是本世纪初中国确定的一个重要经济转型战略。它与重工业和现代化等一起承载了促进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方式转型的重要使命。同时城镇化伴随着农业户口转向非农就业,因此城镇化被释义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推手——通过系统性和有组织地削减农业户口,以寻求三农问题的自然解决;而农民批量的市民化改造,意味着更多农民被纳入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农民消费不再能延续其自给自足的状态,因此主动的城镇化将增加社会零售总额,助力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型转型。

城镇化蜕变为单纯土地城镇化的危险确实值得担心。然而,人口城镇化率若等于甚至高于土地城镇化率,是否足以矫正当前城镇化过度扩张问题?一般而言,一地城镇化的发展程度是与当地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

度相匹配的,缺乏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持续的生产率改善,人为制定城镇化目标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成本高昂。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前京沪穗深等致力于城市扩容的同时却带来了本地经济运行成本的高企和经济资源的流失,这些城市白领返乡潮和部分私人部门被迫外迁。

当前城镇化片面表现为土地城镇化,这种不良的特征本质上是经济效率提升速度无法支撑更多的农村人口市民化,归根结底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体现。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前不论是主张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导,还是以重点发展特大城市为主导,两条路线都无法有效提高人口城镇化率之缘由。随着步入老龄化社会,许多城市的财政已经在社保等领域面临压力,目前许多城市的财政收入逐渐难以有效维系现有城市的运营。当前城镇化进程在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中,蜕变为土地城镇化而尽量规避过多人口城镇化(如当前部分城市严格收紧居民户口标准,北京要求落户郊区也需研究生以上学历),就是寄希望于土地城镇化给地方政府带来的“额外”土地级差地租收益,为未来高成本的城市运营和老龄化积累资源。

以土地城镇化率为主的城镇化进

程,还必然引发两种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表面上看,冲突体现为农民集体土地纳入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土地级差地租收益的分配矛盾——地方政府与农民如何分配级差地租产生矛盾;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被城镇化卷入市民化的农民的未来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当前加速城镇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裂变成了地方政府获取庞大资金与农民为了生存发展权之间的一场非对等博弈。在这场利益冲突式的博弈中,一旦被市民化的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级差地租以保障未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权利,那么这些因城镇化而变身为市民的农民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们认为,目前拉丁美洲等诸国盲目追求城镇化率所带来的大量城市贫民窟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反思。

不仅如此,以土地城镇化为主的资源投入式粗放型城镇化面临着两难冲突。即在生产效率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城镇化加速扩张,主要动机是为未来更高的城镇运营成本筹集资金,而这需继续加大土地城镇化以获取新的“额外”级差地租,但这种循环却使城市陷入越来越大与运营成本越来越高的两难之中。

具体而言,城镇化派生出的巨大基建投资必然使更多的经济金融资源重资产化,而真正能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服务性私人经济部门,却因经济

金融资源过度向政府主导的基建领域配置而面临资源被挤占之隐忧,从而使诸多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和服务面临供给冲击,并最终通过通胀加以反映。

目前城镇化扩张所带来的基建投资和重工业投资扩展为主的产业升级,都属于投资回收期较长、且依赖国际技术外溢(依赖FDI)。这种粗放型的城镇化和重工业化投资模式,更多是以重资产的形式沉淀了国内储蓄,其所带来的是GDP的增长,而非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种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粗放型投资增长模式若无法及时矫正,很容易把中国经济拖入滞胀风险之中。

由此可见,我们认为城镇化率既不是单纯提高土地的城镇化率,也不是单纯提高人口城镇化率。有效的城镇化应当是与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专业分工相匹配的,是以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发展水平为依托的。否则,过度大兴土木的城镇化,不仅无法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相反会导致当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固化和强化,乃至使经济陷入通胀甚至滞胀。因此,要尽量舍弃过度规划式的城镇化,更多地让城镇化依据自身轨迹演进,也就是说,搞城镇化不能拔苗助长。

焦点评论

公务活动“外包”乃权宜之计

朱四倍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据媒体报道,近日山东省多个部门联合推出新举措,推行将公务活动委托旅行社办理,意在节约成本,提高行政透明度。

据报道,把公务活动委托给专业旅行社办理费用将可节约15%至30%。山东嘉华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张明说,吃住行是旅行社的专长,比机关自己组织公务活动花费要少得多。以到欧洲公务考察为例,每人可节省出1万元到2万元的费用。看来,这一举措挺有吸引力,不过,这能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吗?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之策?

就笔者的观点,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更是一种次优选择。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反思的是,旅行社可以做什么,为什么政府部门做不到?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干脆借鉴旅行社的一些做法而是把公务活动外包呢?

此前发生的“去赌城考察人力资源”等事件告诉我们,三公消费并不仅仅是“公务活动外包”所能解决的,如果迷恋于公务外包活动一时的成效,很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甚至把本应做到的事情当成一种“政绩”来宣扬。可以说,政府公职人员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不良行为,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丧失民心,社会影响极坏。这种现象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约束。

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官员讲排场、讲阔气、公车私用都会成为丑闻,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更严重,可能下台。据

报道,芬兰中央银行有位行长,有一次在公款宴上点了一道叫鹅肝的菜,按照该国的规定,所有的公务接待都要向国民公布,诸如接待什么客人,吃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要上网公示。这道鹅肝的菜被公众认为“超标”,传媒曝光,众议哗然,结果这位行长引咎辞职。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就为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之职。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恰恰相反,把公款消费当成了“特权”甚至是“能力和水平”的象征。而这决不是公务活动外包所能解决的。

三公消费是行是财政预算软约束的表征——预算编制与决算编制脱节。公共预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预算,其编制和确定都必须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但我们的预算,内容粗略,难以对其进行实质审查和监督。同时,我国政府预算只反映了预算内和部分预算外的财政收支活动状况,大量预算外、制度外的公共收支行为仍然游离于预算的监督约束之外,破坏了预算的完整性。预算内容还不够细化,预算外资金违规使用现象普遍。三公消费泛滥根本原因就在预算缺乏透明和公开、细化。

正如专家所说,要根治公款滥用,还是要依靠制度上的转变,保证公共财政支出的阳光化。不仅要控制公务活动的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要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提高行政效率。因此,公务活动“外包”仅是权宜之计和次优选择。



赵乃育/画 孙勇/诗

楼市调控将成空? 总理再度敲警钟。责任一定要落实,力度坚决不放松。安居舒缓百姓急,涨价加剧民生痛。体制弊端当革除,重患从来因养痍。

欧元区暂未进入加息周期

陈业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欧美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维持了近三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的讲话表明,美联储暂无退出刺激政策之意。而在反通胀方面态度更为强硬的欧洲央行却意外地在3月表达了强烈的加息意愿,并且在4月7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基准利率上升到1.25%。这是欧洲央行自2008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行动,也是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以来,大型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启动加息的央行。同样在4月7日,日本央行宣布维持零利率不变,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于0.5%的超低位不变。

欧洲央行的此次加息决议,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从反通胀的单一目标来看,欧洲央行加息当然是在情理之中。根据欧盟统计局3月31日公布的数据,

欧元区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初值年率上升2.6%,为29个月来最高水平,再次高于欧洲央行2%的控制目标。同时,欧元区“火车头”德国的经济十分强劲,应该能够承受加息的冲击。德国经济部4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月制造业订单经季节调整后月率上升2.4%,年率上升21.7%,远超市场预期。德国《世界报》4月7日的报道也指出,德国八大顶级经济研究所联合公布上半年经济预测,称明年两国德国经济将分别实现2.8%和2%的增长,这一结果明显好于去年秋季2%的预测。既然通胀攀升,经济转暖,加息似乎无可厚非。

然而,如果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量,欧洲央行此次加息还是略微显得有些激进和冒险。首先,欧元区近期通胀率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是国际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欧洲央行的加息决定,并不能改变美元流动性的泛滥,也不能稳定

利比亚和中东的局势,因此,对于抑制欧元区能源价格上涨恐怕作用不大。其次,虽然德国经济甚为强健,但欧元区边缘国家目前仍深陷于债务泥潭之中。4月6日,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宣布,因财政状况已经难以维持,葡萄牙政府已经决定向欧盟委员会申请财务援助。至此,葡萄牙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三个申请救助的欧元区国家。当天,葡萄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上升至8.78%的新高,其融资成本将在欧洲央行加息后进一步走高。其他几个边缘国家同样如此。据瑞信分析师Luca Paolini估计,欧洲央行加息,会让希腊在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债务增加1.6%。因此,加息可能会使欧债问题雪上加霜。

由于欧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存在这样的不平衡性,欧洲央行恐怕也不敢排除未来货币政策出现反复的可能

性。因此,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4月7日强调,“欧洲央行并未决定开启加息周期”。这意味着,欧洲央行是否会持续加息还是要视欧元区边缘国家的承受力和欧债问题的演进而定,目前欧元区货币政策可谓正处于试验与观察阶段。对再次加息预期的强烈程度,很可能主导下一阶段欧元的走势。如果欧元兑美元一直维持在1.4的高位之上,将对欧元区的出口、旅游、教育等行业产生抑制作用。对中国的出口商而言,欧元的坚挺却是一个好消息,欧元的走强很可能带来欧洲方面更强劲的外需。

总之,在一片质疑声中,欧洲央行率先踏上了退出刺激政策之路。利差套利的因素和币值信用的增加将使欧元有望继续保持强劲,但这给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和债务问题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欧洲央行会不会持续加息,恐怕需要度过一段观察期才能有定论。

(作者系安邦咨询研究员)

争鸣 | Debate |

从艺术品股票看金融创新

天津文交所 勿蹈郁金香泡沫覆辙

刘纪鹏 高梅

2009年9月17日,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所以1.35亿人民币的资本金注册于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天津金融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重大创新内容,文交所被隆重纳入天津市2009年金融改革创新20项重点工程,一时风光无限。原本充斥着股票、债券这些不舍奢不浪漫的赤裸裸的纯金融产品的市场似乎瞬间涌入了一股清新浓厚的艺术气息。然而,艺术品离开拍卖所走入交易所、从整幅易主到切分交割、从艺术收藏到投资交易,文交所是否真的创造了“平民”艺术品创新投资模式?答案恐怕不是期待的那样美好。

艺术品证券化无根据

在金融领域引入艺术品,天津文交所可谓大胆创新。天津文交所交易的产品从概念上是被份额化的艺术品,但是实际上除实物持有者以外,任何参与投资的个体都不会实际地拥有该艺术品,哪怕是他所占有的部分,因此文交所所交易的产品从本质上是一种永远无法兑现的权证。艺术品的本质属性是一个物品,而物品却是不可以证券化的,因为它不符合证券的基本特征。常见证券例如股票,它本身是具有收益性的,可以给投资人带来红利分配从而实现收益;它又具有表决权,背后有着股东会、董事会、CEO和监事会等一系列保护投资行为的治理结构。同样再看债券,债券虽然不同于股票,没有表决权,但是它具有各种法律机构提供的到期还本付息的保证,同样是具有收益性的。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其本身就能为投资人创造一定的利润。而艺术品,如在天津文交所交易的画作,则是一个典型的金融泡沫而不是正常意义的证券。

艺术品证券化的性质有两层:第一,它是一种金融行为,因为已经证券化了。第二,证券化并没有创建在企业法人股份的基础上,而仅仅停留在一件艺术品上。这样的产品其本质属性上是属于股票类还是债券类的投资品种实难界定。我们能看见的仅仅是它具备股票证券类投机买卖赚取价差属性的属性,却没有股票本身可以带来自益权和他益权、收益权和表决权的特征。可以说,艺术品证券化没有创造利润的功能,但它确有股票投机这样的表象,因此证券化的艺术品可以走进文交所像正常证券一样交易,实质上这样的证券化过程是根本没有根据的。非法人类的、不能直接创造利润的物品只能走拍卖,不能走股票交易所的路子,不能走证券化品种的路子,因为法人形态上整体化的同时又在价值形态上份额化的只有公司。任何非法人物品都不能实现使用价值单一化的同时价值却份额化,被无数人所有。

监管空白下的泡沫风险

天津文交所首批上市的艺术品就有画作一度实现净投资回报率10倍以上,如此疯狂局面发人深思。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615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而这个价格约可购买15头牛,或者6000公斤的奶酪。郁金香掀起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投机热潮,

泡沫由此诞生。花卉本身的价值远远无法支撑这样的价格水平,而人们热炒无疑是期待他人接盘承担泡沫。天津文交所的天价艺术品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博傻道路,低门槛、T+0交易的规则,让本身无法创造利润的艺术品成为热炒的焦点,只要有人肯接盘,这样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会一直上演,泡沫破灭时,最后的接盘者就是最大的傻瓜,承担巨额买卖价差损失又无法从艺术品本身获得利润补偿。然而,郁金香、君子兰可以单支卖,无外就是单个炒家承担风险;这幅画如果出现了法律风险,却同时被上万人持有,最后分割的时候是很难想象如何分配这样的责权利关系的。

这样一种严重的隐患背后却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予以约束,更没有实际的监管机构直接进行监管。法律上没有明确制止这样的交易形式,可以说文交所钻了一个文化产品的法律空白;而证监会主管深沪两所,目前并没有明确将天津文交所纳入监管范围,因为证监会主观上也不会认可天津文交所内交易的既没有活生生的法人支撑、又没有利润作增值保证的产品是真正的证券。一个从事艺术品收藏的法人可以申请上市,在天津建一个供这样的法人上市的交易所也是完全可行的,但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危险的文交所。

放任的结果必定惨痛

天津文交所虽建立时间不长,却已积累了相当的资金规模,由于买卖的资金只是在炒家之间互相分配,文交所本身的获利渠道就是手续费。频繁的交易让文交所获得巨大利润,这种利润的来源却是投资者的自有资本,可以说,投资者之间是一种永恒的负和博弈。

这样一个文交所目前还处在萌芽时期,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是如果加以制止,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参与投资者的增多,其隐含的风险将不断扩大,最后将引发金融秩序混乱。这种游戏既没有给市场注入高雅的艺术气息,又不能给投资者带来真正的利润回报;最终哪些人暴利哪些人亏损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而是会在今后直接发展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本身就历经波折,这种不稳定的爆发又会进一步放大人们对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的消极情绪。所以,这种交易模式的危害不可低估。与其让它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沫,然后破灭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如现在立刻制止它。

以笔者之见,天津迫切要建证券交易所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国务院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作为政策依据。从过少的证券交易所束缚我国扩大直接融资的瓶颈这一现实出发,在继珠三角的深交所、长三角的上交所之后,在环渤海地区组建天津股票交易所是值得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十二五”规划中探索的;但若因为正常的证券交易所暂时建不起来就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这不仅对天津未来的金融发展规划与创新没有贡献,甚至难免产生不利影响。

(刘纪鹏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高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件至ppll18@126.com。